

# 中央 权的现代民族国家之所以可能 ——评孔 力《中国现代国家的 源》

磊杰\*

**内容摘要：**何为“现代国家”？此等“现代国家”之建设在中国又是如何成就的？为何“ 向共和”之 上时时凸显着中央 权的导向？更进一步，经 亥 命到建国 命的 38 年历程而实现的中央 权制和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是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是否意味着所 的“威权”体制在中国漫长的政治演 中承 着某种自洽的内在延续性？在很大程度上，所有 些皆是当代著名中国史学家孔 力先生《中国现代国家的 源》一书要着 讨论或留下 空 的中心 一。本文便是对孔 力先生讲 的 一复线发展方向故事的简要评 ，并 对此书建基于演讲稿的行文特点而对他在其 有意留白的 一或未尽之思给予 一步的理论补充与初步梳理。

## 导论

或许受桑原 藏观点的影响，沟口 三曾指出中国历史上有四大变动：秦汉帝国的建立、唐宋变 、明末清初的 换、清末民初的激变。<sup>1</sup>结合其著作综合研判，秦汉帝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从封建制向 县制的中央 权式政治体制的 变；经历五代分裂割据的唐宋变 ，则为内藤湖南所断言的中国由 族社会往平民社会的 型；明末清初的 换，乃是在西力东渐影响下中国开始 入 现代的 机；而由此最终促就的肇端于 亥 的清末民初的激变，则是导致帝制彻底终结中国由此 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开始。在本 上，从秦汉延续至清朝的中华帝国并非一个“国家”，而是由承受天命的天子来统治的包括“中华”与“四夷”的所 “天下”，是由士大夫 层主导的列文森意义上的“文化主义”政治构成

\* 法学博士，厦 大学法学 助理教授， - : 99@126. 。衷心感 河南大学法学 绍敏博士对此文初稿提出的修改意见。

<sup>1</sup> 日沟口 三：《 亥 命新论》，林少 ， 光兴、孙歌、刘 芳编：《 新思考中国 命》，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 2010 年版，第 109 。

体。<sup>2</sup>此等政治构成体存续了两千多年，只有当 19 世纪晚期 “洋夷” — “他者” 的强有力挑战，其统治地位 以为继之时，才不得不放弃文化主义而 向民族主义，以此 图 建立新的政治构成体来维持自 的认同。<sup>3</sup>在 一种情势下，此时被视为西方富强之本源的 “民族国家” — — 一主权的唯一合法的表 形式 — — 开始成为政治精英所 求的理想模式，希求 自我改 而 入现代国家体系的 “建国” — 成为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 向的中心议 。

么，何为 “现代国家”？此等 “现代国家” 之建设在中国又是如何成就的？为何 “ 向共和” 之 上时时凸显着中央 权的导向？更 一步 ，经 亥 命到建国 命的 38 年历程而实现的中央 权制和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是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是否意味着所 的 “威权” 体制在中国漫 的政治演 中承 着某种自洽的内在延续性？在很大程度上，所有 一些皆是当代著名中国史学家孔 力先生《中国现代国家的 源》一书要着 讨论或留下 空 的中心 。

如他所言，“年复一年，20 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故事似乎是杂乱无章的，也是具有多 发展方向的。但如果将 20 世纪当作整体来看待， 便成了一个关于中央 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 的故事”（第 119 ）。本文便是对孔 力先生讲 的 一复线发展方向故事的简要评 ，并 对此书建基于演讲稿的行文特点而对他在其 有意留白的 一或未尽之思给予 一步的理论补充与初步梳理。

## 一、原本如此：建制议程的唯一性与延续性

对于晚 美国中国 世史研究，在 1984 年出版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美国学者柯文探讨了其 彰显西方中心观的三种偏见，即 “冲击—回应” 模式、“传统—现代” 模式及 “帝国主义— 命” 模式，并提出在 1970 年代便已出现的一种所 的 “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的替代模式。其核心特征在于史家探索历史现 时 取的 “内 取向”（internal approach）视角：“ 别 一种新取向的主要特征，是从置于中国史境（Chinese context）中的中

<sup>2</sup> 参见 白永瑞：《思想东亚：朝 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 》，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139-142 。

<sup>3</sup> 参见 美 杜 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等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5 。

国“着手研究”，<sup>4</sup>即“极力尝试从中国历史的观点出发——密切注意中国历史的和中国人对自我的看法——而不是从西方历史的期望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中国历史”。<sup>5</sup>换言之，一种事实上的移情方法，要求史家摒除作为“局外人”的种种“偏见”，以便进入“局中人”的世界，从社会内部依循中国社会自我的观点探索其历史发展，而仅将其历史视作西方历史的单纯延续。回来，作为一种中国世史“内在取向”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孔力在以往出版的两著作中皆行了此等路径，将关注点置于中国内在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以此出发来分析与评判中国的历史。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他讨论地方军事化发展及农村基层社会的结构变化，意在说明国家权力对下层的渐渗以及因晚清绅权扩大而引发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蜕变。而在《叫》一书中，他对君主与各级官僚之围绕言而展开的一系列综复杂关系的描述，力图揭示帝制晚期政治体制的基本运作特点及蕴含的内在张力。<sup>6</sup>如果，中华帝制的政治结构在实际上呈现为一种“君绅共治”体制，那么，两书则分别侧重于彼此互补且始终保持互动的两个维度：“君主”与下层士绅（准官僚）的关系维度；“君主”与上层士绅（官僚）的关系维度。在此等意义上，《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恰为孔力用“内取向”研究，将以往两书根本关照内容进行系统提炼与理论统合的产物：分析“共治”体制在帝制晚期根本危机的深层原因及基于路径依其其对晚清政治取向的制与塑，以中时段视角来阐明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以及与之相关的“根本性”的提出和“根本性议程”/“建制议程”的设定，为何是一种“中国的议程”（第1）。借助一种理论归结，在某种意义上，孔力得以最终成就其孜孜以求的对于中国世政治—社会演变基本趋势及其内在动因的宏大理论体系的建构。

“现代性的构建”构成了20世纪历史向的中心议题与最具权威性的一种意义形态，而作为现代性构建关键环节的中国“现代国家”是如何形成的，则是孔力四十年来以“中国经济”为“实验室”而探求的一个核心议题。然在此书中，何“现代”，何“现代国家”，他并未给出明确界定，而只是将政治参与、政

<sup>4</sup> 美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0页。

<sup>5</sup> 美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同上注，第250页。

<sup>6</sup> 参见美 孔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美 孔力：《叫》，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治竞争与政治控制三个维度作为衡量现代国家的基本指标。在 ，与其他明显参照的是欧美自由主义—多元主义的政治模式，毋宁 他只是从形式上借用了 一种易于（西方） 者理解的叙 结构，而在事实上则是 分析中国内在 一 与时人对之 行的内 思考来彰显此等结构的有 涵括力与解 力，最终“暗度 仓”巧妙地构建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式的反叙 结构。对于中华帝制晚期而言，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虽属“根本性议程”/“建制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的应有之义，但实 上三者根本上并不能等 观，前两者独立存在的维度并不明显，在很大意义上，政治控制——无论是自上而下 是自下而上——始终就是唯一存在的根本性议程。即便在西力东渐的影响下，它也只是制 了一个新的 境（context），一种观察理解老 一 的新框架（framework），一套借以获取更大正当性的 与解决方法，并未改变“机制上的深层结构”（序言第 7 ）及其塑 的构建强大国家的终极 求。在 种意义上， 者在“导言”中效法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一 归结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后来呈现“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态势（第 17 、第 23 ）， 乎是对孔氏研究思 的一种 于化约式的 ，毕竟无论在帝制晚期 是在 向共和的中国政治棋盘上，两者与政治控制的维度始终并未构成一种对等的博弈关系，甚至亦从未成为基本政治考 的一种独立存在的因素，而只是甚至 始终是政治精英借以 致中央 权式政治控制的手段与工具。

先，在帝制晚期，异于 乾年 的文化专制，嘉 年 经世致用思潮开始 振，从根本上 ， 是当时社会矛盾加剧 使统治 团寻求对策，忧国忧民之士 图力挽 波的反映。 溯其地域渊源，不 发现，明末清初经世思想家的故乡湖南、江浙， 时又成为经世派最主要的发祥地（湖南以 澍、 、 源为代表；江浙以包世臣、 自珍、冯桂芬为代表）。 种思想传承直接决定了他们所持治国之 的根本目的是使得处于空前危机中的王朝 应现代条件的挑战，从而使其能强大 来，并更为有效地 作。在本 意义上，“是要加强 个孕育了他们的文化并 就了他们的地位的政治体系”（第 109 ）。一方 ，他们提出的一系列所 扩大“政治参与”的建议，原本就是同国家权力的加强自然绑定在 一的，两者存在“理”所应当的 推演关系，以图“ 文人们更为热 地承担 任以及更为广泛地参与政治，从而在国家变得更加富有生气的同时，也使

得威权统治得到加强”（第 31 页）。他们设想的，绝对是带有根本性的改变，更不是革命，而是“一个更具有活力、也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第 43 页）。与之紧密关联的另一方，则是他们把应对中介掮客，当作根本性议程中应予最优先考虑的事。对 19 世纪上半期改革焦点的漕、盐务和河工存在的弊端，源的主张是尽可能减少官僚体系对一些活动的介入和干预，消除大吞噬政支出的人为因素，而冯桂芬在设想上虽无多大不同，但要求改革体制的言论更为激烈，毫不含糊地主张“漕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河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盐政之督抚已，至同、副、提举等官……必宜全裁”。<sup>7</sup> 改革的目的就在于因应 19 世纪中国国家面临的畸形现实：农民因不堪忍受苛捐杂税而揭竿而起，然国库收入却仍不敷开支所需。在此情势下，人口压力的危机，极易使得原本主要属于行政上的问题变成政治上的威胁（第 89 页）。由此，为消除危机根源，就必须控制或排除横亘在“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亚官僚层（胥吏层），尽可能杜绝“创收政治文化”（第 86 页），以求最大程度地巩固与强化中央集权。在某种意义上，此等明智的改革要求与前扩大“政治参与”的主张可异曲同工，只不过一方是间接手段，而另一方是直接措施。

参照欧美政治模式，孔力将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三个维度作为衡量现代国家的基本指标，然而，对帝制晚期政治精英的思想—制度探索的解构，他证明了绝对是一个妥协的叙事结构。他们关于政治参与思考并未出传统“忠君济民”思想的范围，其源头活水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事实上，之所以吹广泛的政治参与，其理由并不在于关乎自然正义，关乎天人权，更绝对可以制约国家权力，而在于将有助于提升政府的有效性，有益于强化国家权力（第 45 页）。尽管一些发掘出来的旨在推动变化的观念是传统思想中与近代思想最为接近的部分，是对传统思想进行代改不可缺少的基础，但它们始终是源自中国“内”的本土来源。故而，他们从未图就政治权力的本原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力正当性基础的问题，更未涉及到西方宪政设计中的权力制衡问题。

---

<sup>7</sup> 参见李少军：《两来世剧变的经世学人：源与冯桂芬》，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1-102 页。

其次，19世纪最后30年，西方主导的新的世界秩序开始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唯一得到承认的历史演员便是具有主权的民族国家，而支撑建国运动的意识形态力<sup>2</sup>亦正是此等民族国家体制。19世纪末期，在西方强大军事力<sup>2</sup>前<sup>1</sup>作为普<sup>1</sup>主义的天下观再以支撑下去，并渐<sup>1</sup>为秉持民族主义的国家观所取代，而当时获得普<sup>1</sup>接受用来解<sup>1</sup>由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所构成之世界体系基本原理的<sup>1</sup>化论，成为具有根本性关怀的知<sup>1</sup>分子们寻求自强变<sup>1</sup>以拯救中国的内在根据。在此等情势下，旧的根本性议程<sup>1</sup>的内容以改头换<sup>1</sup>的形式<sup>1</sup>新呈现：“在一<sup>1</sup>程中，关于政治参与和权势力<sup>1</sup>之<sup>1</sup>、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sup>1</sup>以及国家与地方之<sup>1</sup>关系的老<sup>1</sup>一<sup>1</sup>，以民族主义和公民权利的新<sup>1</sup>言被提了出来”（第24<sup>1</sup>）。在所用<sup>1</sup>汇改变的同时，其内容也<sup>1</sup>着时代的演<sup>1</sup>而获得更新，但在很大程度上政治—文化精英们提出的自强之<sup>1</sup>却仍源自中国传统的<sup>1</sup>源，伴<sup>1</sup>时代演<sup>1</sup>所提出或推行之举措的最终目的仍旧是在列国竞<sup>1</sup>之时代如何成就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

20世纪前后十年，关于政治参与的看法在中国是<sup>1</sup>一种从实<sup>1</sup>经<sup>1</sup>中得出的地方自治观念而得以表<sup>1</sup>，孔书即以此作为讨论主<sup>1</sup>一<sup>1</sup>上<sup>1</sup>观点。可以<sup>1</sup>，19世纪晚清儒家所<sup>1</sup>同的在皇权下自治的空<sup>1</sup>是以“封建”——<sup>1</sup>一可以动员的传统——来获取正当性的。斗基和沟口<sup>1</sup>三等人的研究表明，“封建”在历史上曾被用作对抗中央<sup>1</sup>权的国家统治的传统，然到了晚清，此观念却<sup>1</sup>被用作<sup>1</sup>制皇权的变法计划。<sup>8</sup>正如孔氏敏<sup>1</sup>观察到的，“作为外来观念的‘自治’<sup>1</sup>一<sup>1</sup>，似乎同中国古代关于‘封建’的复杂的观念体系——<sup>1</sup>是建立在对于人性的不同于西方的观察之上的——有着相似之处”（第117<sup>1</sup>）。事实上，在地方自治蓝图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sup>1</sup>被建构的亲密无<sup>1</sup>的关系，就源于“一种私家的亲情向公共<sup>1</sup>域的扩大”<sup>1</sup>一<sup>1</sup>新挖掘出的中国古老的“封建”传统。<sup>9</sup>而“根据<sup>1</sup>种看法，由国家权力中枢所任命的官僚机构的强制性行为，永<sup>1</sup>不可能像地方<sup>1</sup>袖治理社区时<sup>1</sup>样产生善政良治”（第117<sup>1</sup>）。正是在此等意义上，“自治似乎成了唯一可以同专制权力相抗衡的力<sup>1</sup>”<sup>2</sup>（第118<sup>1</sup>），而<sup>1</sup>种建构

<sup>8</sup> 参见美杜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等<sup>1</sup>，同前注，第148<sup>1</sup>。

<sup>9</sup> 美孔力：《封建、<sup>1</sup>县、自治、立宪：晚清学者对中国政体的理解与倡议》，华人<sup>1</sup>，<sup>1</sup>中国社会科学代史研究所编<sup>1</sup>室编：《国外中国<sup>1</sup>代史研究》（第27<sup>1</sup>），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sup>1</sup>。

传统的目的就在于吸纳封建时代分权统治的合理成分来冲抵县制的度权的弊端。

根据梁启超的观点，自治的社会恰如军队，“其军队之将帅，则群中人人之良心所结成的法律是也”，法律是由结合了每个人自然的利他动机与精神而成，是个人品格修养的延伸，而正是“一种意境内在化的社会自律的意念，是自治动的真之所在”（第115页）。其推演的关键在于，欲求实现“自治”就必先“向自我”，求个人的自我改造，即儒家所讲的“克己”，“克己之自胜，自胜之强。自胜焉，强焉，其自由何如也！”在梁氏看来，为求“自由”，则求“自强”；为求“自强”，则求“自胜”；求“自胜”，即为“自治”，“自治”与“自胜”仅一步之遥，“自胜”才是社会规范的最基本一，才为自我实现之关键。不难发现，梁氏时已将自治的原义从自我治理、自我统治(self-rule, self-government)变为自我节制、自我克制(self-mastery, self-control)，即将政治意义上的个人自治，本土化地解释为伦理上的个人自治（自制）。<sup>10</sup>梁氏认为，强国必先强民，国人当务之急在于求一己之自治与求一群之自治（后者将以前者为基础），恰如人的肌体的生理构成，每一个细胞包含着完整的基因密码，就可为作为整体的肌体提供机能。“在一些自治的‘小国’和更大范围的国家实体之间，并不存在着冲突。国家只不过是些小国的‘扩大的图景’，所以，如果自治可以在一些小国实行，那么，有效的自治当然也可以由国家根据它们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第116页）。为阐明其观点，梁氏借助的是达尔文的“总体”和“个体”的譬喻。因为“总体”只不过是“个体”的合体，由此显然只有强壮的个体才能组成一个强壮的总体。<sup>11</sup>显而易见，他理解和欣赏的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并非斯塔特所称的“达尔文式的个人主义”，而是他所称的“达尔文式的集体主义”。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机制，他最关注的竞争是他所称的国家的竞争（“外竞”），而一个国家内的竞争（“内竞”）。<sup>12</sup>

不难看出，虽“自治”的基点被下放到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一个人，然而个人却并非所个人权利的基础，亦与人权理论所讨论的个人概念无关。梁氏

<sup>10</sup> 杨德：《自由与自治：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个人”》，《二十一世纪》2004年8月第84期，第32页。

<sup>11</sup> 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sup>12</sup> 参见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同上注，第120页。

最关心的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群体的权利，或更具体地说是中国的国家权利，惟有在集体主义的框架内其主张才能与西方的个人主义达成妥协。可以说，以梁氏为代表的政治知识分子精英的“地方自治”主张是在中国传统思维下求新的一种努力，是“把传统的以封建理想为中心的变法精神与适应多变的现代化要求相结合的产物”。<sup>13</sup>他意图通过对地方与国家利益之整合行此种“水到渠成式的整合”（第117页），来对专制的中央权力行“改造”，以求自下而上由点及面的途径，最终推动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在中国的确立。由此，在一种观念下，所谓的“地方主义”并没有确定的意义，他的讨论只是着眼于地方政治的精神心理基础，而所谓的“地方自治”思想，也只是用来为在中国范围内行政权力的均衡提供理论根据而已。换言之，借助地方自治制专制君权的目的，在终极意义上仍在于意图促成集中化的现代国家中央权力（开明专制）的实现。即便这种渐进主义很快即被干涉性极强的国家主义所消灭，即便梁启超很快地完全向国家主义立场并在民初立宪之时强烈吹“主权在国论”，但他也许从未彻底放弃一种混杂的“自治”观念。在此种意义上，他的“取向”与其说是一种知识分子层的明显断裂，毋宁说是其宏大思想系上的一脉相承使然。就此，孔力在一篇研究晚清地方自治的文章中得出如下结论，可谓切中肯綮：“对梁启超而言，宪法与立宪的力量既不在于它具体的代表选举的机制，也不在于它分权条款的条款，而在于它的精神鼓舞作用。而分权的思想，只是在它能够进一步促进最终的权力中和权力强化的范围内，才显示出意义”。<sup>14</sup>

在此书前言的结尾，孔力同样提到，“‘根本性议程’的长期影响力，是从一带接一代的传承中体现出来的。其所揭示的，是历史演变在机制上的深层结构”（前言第7页）。换言之，他意在表明，只要所谓的“深层结构”保持不变，在中国现代和帝制晚期的种种表象背后，旧的议程必将在新的环境下一再表现出来（第102页）。根据我的理解，所谓的“深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便是与历史传统相互依托的社会—政治体系，而同一议程在延续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出现，就意味着此等体系仍然具有制约作用。在从帝制朝向民族国家类型的大时代，成就

<sup>13</sup>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9, 136.

<sup>14</sup> 美孔力：《封建、县、自治、立宪：晚清学者对中国政体的理解与倡议》，华人，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所编室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7卷），同上注，第10页。



以从“旧秩序”向“新国家”、将“天下之民”改为“国民”、由“地方分权”向“中央集权”为基本使命的“旧—新”，或许只有到1949年建国革命成功之后才具备完满实现的现实可能。

## 二、为何如此：中央集权制的历史性与必然性

综上所述，在孔力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政治控制始终是帝制晚期直到建国革命—历史中时段唯一存在的根本性议程。只不过，19世纪60年代以后，其原有维度发生了大改变：在体制内，地方主义渐次做强，并就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统合困境成为以后百年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问题；在体制外，横亘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力”问题，一直未获解决而延续下来，并与前者相互影响相互补强，实质性地制约着国家政权建设的深化。虽然，以今日视点事后观之，中国之历史大势是经辛亥革命38年后实现的中央集权制和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然而，历史的实际发展却不会只存在一种可能结局的宿命。特别是在20世纪的最初20年，随着时势发展，联共主义政治思潮日益获得合法性地位，成为一种有力的势力，并同建立强势单一制国家的努力形成对峙之时，似乎预示着中国政治发生本质变化的大可能，但此等尝试却在昙花一现后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合法的产物——中央集权观念最终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地位。那么，经辛亥革命到建国革命之历程而实现的中央集权制的现代国家是如何在中国最终成就的？换言之，中央集权的国家何以能够在同“中介力”以及地方自治现象的对抗中最终完全压倒对手而占据上风？或许正是孔力此书意图最终弄清楚的。对此，结合上述政治控制的两个维度，我们不妨探究联共主义国家观为何最终落败以及“中介力”障碍如何最终获排两个问题，来完成对此宏大终极命题的梳理与解答。

辛亥革命时，并无一定某一取清朝而代之的新体制。辛亥革命的历史特征之一，就在于其采取了各省独立—形态。所谓“独立”，便是省的权力自清朝统治体制中脱离出来，由此导致中央集权的王朝统治体制的瓦解。<sup>15</sup>为填补这一瓦

<sup>15</sup> 参见日沟口三：《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孙歌校，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78-81页。

解后的空白，各种各样的国家构想便在 命后的中国交 出现：或以新的王朝体制取而代之，或建立新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或各省联合的联 制共和国，或建立新的中央 权制民族国家。作为理论可能性，任何一种 择 有可能。但根据沟口 三的研究， 种分权化的地方主义胎动于明末清初县规模的“乡 空 ”，19 世纪后半期为应对内外危机，清政府推行“双 绥 ”政策，得益于此，地方势力开始获得实 性增强，并最终 就清末省规模的“乡 空 ”的成熟及其结果的省的独立。由此，从 一历史推移来看，联 共和国体制在此时似乎是最为现实的构想。<sup>16</sup>同时， 代中国有一 特殊国情，即大约在庚子之役后， 来 多的士人感觉到中央政府在救亡图存方 不可依 。 样， 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中很早就产生了 地方自立 一看似“分裂性”的举措来完成全国救亡 样一种曲折的思 。<sup>17</sup> 种取向无疑为联 制的政治构划提供了理论支撑，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 行一时的联省自治 动便是其发展的 峰。就此，杜 奇 样评论 ，“联 主义者的 围绕着所继承的以强化地方来建国的主 展开，图即使不把省确立为主权政府，至少也要确立为自治政府，并以此作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联 政体的国家的基础”。<sup>18</sup>换言之，联 主义者并不把自己的方案视为对统一的中华民族 一理想的替代，而是视之为对民族统一的另一种解 。联省自治本 并不被视为终极目的，而仅仅是“全中国独立”的前奏。<sup>19</sup>

总体来看， 一时期各派势力其实皆是围绕着如何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 一中心 一而展开政治竞争的。而联 主义者和中央 权主义者之 的冲突，便是代表着几种相互竞争的努力，他们 想促 从地区性制度到全国性制度的 变。就 域的竞争而言，经历激 的五四时期， 了作为现代性的“他者”，“封建” 一传统已不被期望扮演任何角色。由此，联 主义者此时不再用历史 言来为自己的民族国家观 护，而 向了融地方自治与民权于一体的新的 。为 动所 的新名“联省自治”本 即反映了省自治与个人自治的民主意 只形态的

<sup>16</sup> 日沟口 三：《 亥 命新论》，林少 ， 光兴、孙歌、刘 芳编：《 新思考中国 命》，同前注，第 129 ； 见美 弗朗兹· 克尔：《19 世纪中国的地方主义》， 翠莲 ， 中国社会科学 代史研究所编 室编：《国外中国 代史研究》（第 1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2-53 。

<sup>17</sup>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5 。

<sup>18</sup> 美 杜 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等 ， 同前注，第 170 。

<sup>19</sup> 美 约翰：《唤不中国：国民 命中的政治、文化与 级》，李恭忠、李 峰等 ， 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242 。

结合。<sup>20</sup>而反联邦主义者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一直是一个由中央集权的统一政府来实行统治的国家，所以目前的混乱局面只是治乱循环的一部分，早晚会新统一；从现状看，中国不能统一的根源就在于军阀割据，在此等情况下，要求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联邦制，无异于缘木求鱼，绝不可能成就国家的统一与强大。其实，无论是哪方主张，其基础是对作为一个民族的中国历史的独特解释，以及对作用于民族内部的更大的历史力量的不同理解。然而，实际上从当时各省当局主导制定省宪的事例来看，联省自治的确存在为企图维持现状的军阀所利用的一面，而在国家衰弱但国家主义强大的时代往往最易成为被诟病的对象。对此，时人杨荫杭的评价甚具代表性。在他看来，自治不是割据之别名，此主张可能引发国家的一步分裂：西南各省有心人物，因侵略他省失败，“一变而为‘孟罗主义’。其名则曰各省自治，其实则既无余力侵人，又不肯牺牲其势力以求统一，乃不得已而假‘孟罗’二字之新名以标其主义，并假‘自治’二字之美名以耸人观听。其实即封建割据之别名”。<sup>21</sup>

显然，联省自治运动力图用民主的叙述结构来彰显自己的正当性，然而，反联邦主义者却似乎从未放弃从历史的叙述结构来对其进行攻击，将一党一派的“封建”、“割据”勾连起来，径直视其为在自治、自治运动及民权等民主言说的外衣下上演的分裂与分裂主义的历史。而正是延续一批批判思想，以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巧妙地再生产，与当时主张中央集权国家的国民党盟友相呼应，分别从权力政治与权威话语两个层面，最终消灭并从意识形态上彻底埋葬了联邦主义一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他种话语。言之，如上述所论，在帝制晚期的中国，“封建”一词已发展出一种很强的制衡专制权力的历史批判作用，但在独秀使用时，它已成为一个完全意义的字眼，代表着一种新的力量。<sup>22</sup>“它之所以获得此种力量，是因为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范畴之后，它代表着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但是，同样的方式，它开始产生新的意义，以此为中心，20世纪中国错综复杂的现实便被组织起来并开始产生一套新的、19世纪后期关于封建的观念所不曾具有的意义或对社会现实的想象”。<sup>22</sup>可

<sup>20</sup> 美杜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等译，同前注，第180页。

<sup>21</sup> 参见1921年3月12日《申报》，引自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

<sup>22</sup> 美杜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等译，同前注，第192页。

以，革命者对民族语言形成的最终贡献，就在于它对“封建”一词的再发现与再利用。在此过程中，独秀巧妙地将一些所谓的“旧道德的死尸”包装到新道德之中，而一种“新道德便寄寓于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时代性的叙述结构中”。<sup>23</sup>由此，“封建”在不知不觉中从制度论变为生产关系论，从褒义沦为贬义，联省自治运动也在不知不觉中为反帝、反军阀所取代，而失去了其自然发展的希望。<sup>24</sup>对此，杜奇评论，“‘封建’一词意义的改变使联省自治运动的倡导者付出沉痛的代价，因为它抹杀了整个一种他们可以依存的异议政治传统，由此也使之失去了作为一个传统的合法继承者来动员历史为自己服务的一些策略”。<sup>25</sup>场文化战争如此成功，以至于“从此以后，没有任何追求民族主义理想的运动，能够一期期望一种中央集权式的政治组织模式，一不无自相矛盾地声称是现代的”。<sup>26</sup>与此同时，军阀混乱到极点，获得苏俄支持的国民党人开始相信，民族统一才是省级自治的先决条件：“此等真正的自治，必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始能有成……自由之中国以内，始能有自由之省”。<sup>27</sup>就意味着当时的一步势力已然向武力之传统以民族统一的国民大革命。虽然当时几乎无人注意，但1922年6月孙中山与炯明之间的决裂却无疑标志了一种政治上的断裂，而对于联省主义国家观在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以后，中国一直的是一条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其前景是联邦共和制国家的脆弱的民主与自治机关也再也无法在中国一块土地上立。

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重新树立中央集权的政权，关于联省自治的讨论自然以为继。然日本的入侵，致使全民战争爆发，中国政治的中心主由“集权与分权”导向“反帝反殖统治”，历史以抵抗列强尤其是日本的侵略与民族主义的昂为“踏板”，急切地向了捍卫与建设中央集权式民族国家的方向。为应对危机，国共两党被借用与对手同样的军国体制，<sup>28</sup>并围绕争夺抗战

<sup>23</sup> 美杜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等，同前注，第191。

<sup>24</sup> 参见日沟口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08-109。

<sup>25</sup> 美杜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等，同前注，第192。

<sup>26</sup> 美约翰：《唤不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李峰等，同前注，第240。

<sup>27</sup>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30日），参见李剑农：《中国百年政治史：1840-192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8。

<sup>28</sup> 一种军国体制对事后中共的国家建设产生的大影响，其直接体现就是建国初期在全国六个大区实行的党政军一体的分权体制。一种治理策略有利于内战结束后占各处的各战军，而不利于在敌后战斗多年的地方游击，后者被认为与地方关系于紧密而不利于建立一个忠于中央的政治机构。参见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108。

的主导权而展开竞争，毕竟“抗战”就是“建国”，其主导权归属与战后新政治体制的确立紧密相关。<sup>29</sup>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便是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就抗日民族主义的领导权而展开的竞争中取得胜利的结果，但同时，这一过程也对其政权建设产生了结构性的制约作用：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在新的政治共同体之内，而是不得不在已经习惯的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来实现。<sup>30</sup>按照沟口的说法，“虽然在其肢体上烙印着来自日本主义（帝国主义）和西欧文明的印记，发生了料想不到的变形；但是，尽管用了否定的方式，它在最基本之处仍坚实地继承了自己的历史，中国又终于‘作为中国’得到了新生”。<sup>31</sup>换言之，它不仅要继承清朝的版图，而且也要承续清末以来政权建设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当然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也根据社会主义的目标重新对其进行了了解，所以在国家统合方式上也必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崭新方向。在孔书中一点描写的新型体制下地方行政的塑造以及中间掮客层的排挤，便是其中体现。

中国试图自我改入现代国家体系的初次尝试发生于清末“新政”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政权现代化中一个划时代的时刻。此时，十年的内忧外患使得政府濒临崩溃，而义和团运动失与《辛丑条约》的签订，最终使清廷相信，自己的生死存亡有赖于一场现代化的计划。与其同时，如欲偿庚子赔款以及支付新政所需的费用，就只能加强国家行政、扩大国家权力以汲取更多税收来实现。根据查尔斯·蒂利的界定，所谓国家政权建设就是一个国家试图拓展、强化其对社会控制的过程。因此，对清政府而言，现代化不可避免地要与此等议一勾连在一起。不对其而言，肃清与巩固农业税源绝非易事。承自明朝的田赋征收中的两大弊端——中间掮客的中间私囊与弊端丛生的征税系统（第78页），囿于国家治理能力所限，直到新中国初期，依然困扰着国家政权。由此，如何控制中间掮客或将他们排挤出去，以及如何将纳税责任固定地建立在人头居所的基础之上（第100页），成为中国步入20世纪的所有政权国家建设议程中根基最为牢固的一部分（第92页）。

与近代早期欧洲相似，20世纪上半期中国国家建设主要表现为，国家在同地方势力争夺税收控制权的对峙中，借助地方行政机构的官僚化与正规化，不断

<sup>29</sup> 参见 白永瑞：《思想东亚：朝鲜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质》，同前注，第158页。

<sup>30</sup> 参见 白永瑞：《思想东亚：朝鲜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质》，同前注，第162页。

<sup>31</sup> 日沟口 三：《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孙歌校，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01页。

“挤”夹在国家与纳税农民之间的“中介力”的过程（第93页）。然与先前欧洲情况不同的是，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与民族的统一亦是摆在新政权面前的共时性<sup>32</sup>。而且，这些要求并不像欧洲一样源于自身内的发展，而是来自外界的强求。由此，这些因素要求政府培养地方领导来实现国家的目的，但为了避免社会和法统危机，地方领导层的建设必然先于现代政权对传统权威的破坏。<sup>32</sup>一种无力抑或不愿触及传统权力结构的导向，无疑在根本上制约了民国时期国家建设的最终成效。对此，杜奇用“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概念加以描述。在他看来，内卷化的国家政权无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从而取缔正式机构的“污中”，而后者正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增加榨取的必然结果。<sup>33</sup>换言之，此等国家政权欲想摆脱社会权力的影响，力图发展一种不受地方精英控制的基层权力机构，但它却无法使得自身完全官僚化，以至于只能依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而必将阻碍国家政权的真正扩张。事实上，民国历届政府未能像日本人一样一举废除旧制。1941年日伪政权在华北强制推行大乡制，取消了自然村的管理职能，强行打散地方乡村的权力结构，代之以对政府指定的行政人员，从而实现基层政权直接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目标。<sup>34</sup>显然，此等国家建设启动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关就在于作为入侵者，他们对摧毁传统的乡村权威结构没有心理负担。<sup>35</sup>

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可整个民国时代的普遍现象，而1949年建国革命的胜利则标志着一种二律背反困境的终结。实行土改与一体化后，新中国完成了民国政权所未完成的国家建设任务，根本上解决了自明朝以来历届政府无法解决的“污中”——偷税漏税和“污中”，即为明证。或许由于他的学生杜奇在其成名著《文化、权力与国家》中对这一过程已有精彩论述，为不落窠臼，孔力就此一笔带过，而将论述重点放在对于中共获此成功原因的分析上。在孔氏看来，与以往政权一样，新政权仍是从排斥中介掮客与稳固纳税责任单位两个层面来因应此等历史疾的。首先，中共土改样的社会革命径实现了对中国农村社会基本结构的改造，“消灭了一个使其‘作为’而使得很大一部分税收收入到不了国

<sup>32</sup> 参见美杜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第4页。

<sup>33</sup> 美杜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同上注，第54页。

<sup>34</sup> 美杜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等译，同前注，第161页。

<sup>35</sup> 美杜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同前注，第201页。

家手的“国家代理人”级”（第94），从而彻底排除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介力”存在的社会基础。正是有于级斗争而致国家独立、解放和富强的意识形态灌以及由党掌控的新式“权力的组织网络”，<sup>36</sup>中共政权在深入乡村时摆脱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有效地实现了社会动员和对乡村社会的整合，由此完成了从保甲制度以来历代统治者想实现而未能实现的制度创新：“创建一个忠实于国家的组织，而一组织又牢固地扎根于自然村之中”。<sup>37</sup>

其次，新政权又以强势国家的力为后盾，农业一体化从基层开始建立了与国家政权相联结的各级组织，从而解决了从帝制晚期到民国的所有政权无法解决的国家向农民和农村实行有效汲取的。之所以如此成功，可以是农业一体化与作为一种特殊汲取手段的“统统”联动的结果。“税收的基本单位，也包括‘统’的基本单位，便是体化之后的单位”（第98），就意味着在历史上次实现了征税单位、土地所有权和政权结构的完全统合。<sup>38</sup>合作社的导者成为国家的税收代理人，在他们导的社会单位中，土地与民众的居所以整合，由此土地纳税任的确定不再存在，税收记录也不再因土地转让而出现混乱，因为市场体系已不复存在，而土地亦不再能够让。虽事后对种激的行政体系行了修正，但“大后的整收缩，社会主义规模的缩小却是同行政控制的强化混合在一的”（第100）。“三级管理”体制，经整，以自然村为基础的生产新成为基本核算单位，而大的具有社会主义性的所有制单位（公社与生产大）则变为行政机构。实上意味着公社开始扮演大致相当于民国时期“乡”或“”的角色，成为农村地区国家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在孔氏看来，乡行政化的实现，意味着国家对于乡村控制的实性拓展，因为与以往不同，公社的导人来自于其他地区，由国家任命并从国家支薪，从而能够使其成为国家对县以下各级实行控制的工具。1983年小平肯定了此等区分开来的做法，就使得在人民公社制度瓦解的情况下，国家对于农村社会的一种行政渗仍然能够生存下来，并延续至今。总之，“土地改和

<sup>36</sup> 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

<sup>37</sup> ,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 1968, .416.

<sup>38</sup> 根据统计，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户，在1950年代早期有1亿个以上，在体化后被整合成大约75万个合作社，而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时代，行政和生产任被合并到大约2.5万个公社的管委会手中。参见美詹姆斯·汤森、布莱特利·沃克：《中国政治》，、董方，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4。

体化在行政上的作用，不啻于国家在更为深入的层次对于农村社会的渗透，也使得国家能够对农村实行更为强有力的汲取”（第100页）。从此意义上，无论从政治层面上是从经济层面上农业一体化运动均实现了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

在对比中、法两国国家建设历程后，孔力得出结论：“只有在社会体系发生基本的变化之后，国家本性的根本性改变才是可能的”（第86页）。事实上，

应为此书的一个根本观点。孔力的“社会体系”即为他在书中数次提到的“深层结构”，深层结构如未实现“基本”更易，新旧政权面对的根本性议程就可能存在共同之处。那么，是否意味着“革命”失去了意义？孔氏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指出，“新国家的各种要求，拒绝了旧政权之下的任何想法。一种国家只是满足于维持现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制定对农民的汲取来强行推动工业化的战略，以及掌握为实际推行这种战略所需要的行政力量，是没有革命便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第101页）。孔力的“革命”，便是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

革命，他将其理解为对19世纪以来的整个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本问题的解决，并为一个现代化运动制定未来的方向。简言之，对内，国有化运动，使得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实现了社会动员，并依社会主义的原理组织农村社会，解决了晚清到民国未能解决的国家税收问题；对外，有效地将社会组织到国家目标中，使落后的中国社会凝聚成为一个统一的动力来完成民族主义任务。<sup>39</sup>然而，支撑实现此等“旧瓶装新酒”强势力量的组织基础却在于在革命中形成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政治结构模式。在孔看来，中共建立新的国家就是此等政治模式的一种投射。<sup>40</sup>伴随政党角色的变化，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得到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发展为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党一国”体制，“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sup>41</sup>而此等党国同构体制之所以具有强势威力就在于：基于中心化的权力集中于政党，其组织结构深深地渗入各个社会细胞之中，政党可在不同层次上直接介入国家行政，从而使得公共行政不再循一般官僚制的传统，而是一种党一国互动，甚至国家本身也成为一种行政政治整

<sup>39</sup> 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4页。

<sup>40</sup> “接受现代意识形态的政党，自然而然契合了中国国情，并发展出一套组织体系，形成一套惯常作法，然后再将此等意识形态、组织体系与惯常作法扩展用于整个国家”。

，1968，285。 ，China in Crisis，

<sup>41</sup>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同前注，第13页。



合的公共行政工具。<sup>42</sup>由此，政治与国家的此等相互统一，消灭了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范畴存在的可能性，不仅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笼罩一切的庞大的国家体制，而且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皆整合到政党的周围。在一种名副其实的“全能主义”式的中央集权体制下，“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国家建设一言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可以说，中国革命并未像马克思预见的那样产生出一个与历史上一切国家形式不同的国家，即向着国家消亡过渡的自我否定式的国家，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一党专政与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复了作为合法地垄断暴力的机器——国家形态。

## 余论

在此书的序言，孔力对其基本观点做了如此声明：“尽管可能会有种种例外，但在我们这个时代，‘现代国家’的特点似乎是符合于‘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的产生取决于国内文化——原则的”。其实是在实意义上肯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根源”之根本动力来自中国内——中国中心取向研究所持的基本思想：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存在一种从18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来的内在的结构和方向；尽管晚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影响，但一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

那么，国内的“国内文化”究竟何指？一种“文化”又如何决定了“现代国家”最终呈现的仍是中央集权式的国家构样态？从过程来研判，如果从辛亥革命到建国革命38年行眺望，我们就将看到：两千年之久的王朝体制的终结——“纵断”的历史过程，是一个经历了与历史的横断——一片战争以来西欧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西洋文明的传入、先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垄断化——冲突和对它的吸收从而建立新民族国家的过程，换言之，也就是克服“三千年以来的危局”，而成就“旧秩序向新国家建设”的过程。<sup>43</sup>然而，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往往先于民族的形成不同，20世纪中国国家政权建设是在民族主

<sup>42</sup> 参见汪晖：《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代序言）》，章永乐：《旧与新：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

<sup>43</sup> 参见日沟口三：《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孙歌校，同前注，第82-83页。

义与“现代化”的 下同时 行的。 是由于旧的统治 级对新的局 缺乏 应能力而 受帝国主义的蚕 ，但 反而使得反对列强支v 的民族主义 动不得 不同时承担彻底变 旧社会=政治体制的任务，由此反帝 动和社会 命的结合， 往往成为中国民族主义一 的传统。在柄 行人看来，因为殖民地化国家的 本是买办和从属性的， 就决定了在 些国家只有社会主义者才能实现此等双 取向的民族主义任务，由此也决定了社会主义者必 取代绝对王权乃至 产 级来完成他们本应完成的历史使命。<sup>44</sup> 种洞见不仅 明了为何“ ”历史 段而 一举 向社会主义的所 “不断 命”理论基本以失 告终的根本原因，而且也 了旨在消灭国家的社会主义 命最终却 向了它的反 ——对旧有国家机 器的保存与强化的内在根源。在很大意义上可以 ，正是 种历史的构 ，决定了中共之所以能够最终获得政权，并承继中央 权式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

从 程来解 ，决定结果的 要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恒久性和至 无上的大中华中心主义。<sup>45</sup>与西方不同，中国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它庞大的规模、相对先 的国家行政官僚结构及其清晰而明确的国家意 只形态。更关 的是它 持续了相当 的时 —— 用西方思维观之，恰如罗 帝国一直演 并绵延到了20世纪 般，由此，像 样一个存续如此 久并具如此 度自主性的体系，其影响力绝不可能仅 于自 制度在形式上存在的 段时 。甚至在新体制 出 旧类型时，传统价值和行为模式也可无 久地持续下去。而大中华中心主义者 乎坚信，可能有的最好社会永 是中国人所经 的，外国的方式也许可以吸收 来，但永 也不能代替中国文化的本 ，显然， 种观念自然强化了其传统秩 序的恒久性。

在此书的结尾，孔 力对 权式中国体制的前景做了如此 测：“关于政治参 与、公共利益和地方社会的老看法， 着时 的推移，会以 少受到中央 权国 家影响的方式而 新得到界定。 么，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 狭 的 基础和僵化的中央 权而获得实现？ 是一个只能由时 来回答的 一。现在， 许多中国人相信， 是办得到的”。不 看出， 是一种 具体体制变 而对 中国政治整体可能 向的基本 估。事实上， 于 多国内和 国因素变 的存

<sup>44</sup> 参见日柄 行人：《世界史的构 》， 京华 ，中央编 出版社2012年版，第236-237 。

<sup>45</sup> 参见美詹姆斯·汤森、布莱特利·沃 克：《中国政治》， 、董方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 。

在与相互化，一系列中国的合理前景比尝试预测中国可能要求的更有意义。对此，当代著名中国学者李侃如先生在其《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一书结尾做出了相对更为系统的合理展望。<sup>46</sup>他认为，根据未来20年的具体发展与选择，向未来的中国政治结构可能会有六种程度不同的可能结果，而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两种对立的前景。

根据他的预测，最具可能的前景是，一个“成功的中国”到2020年可能会实行有限的竞争性选举，但在全国范围内它可能仍将保持一党统治的体制。虽然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党不再禁止一切竞争性的政治活动，也不再保留果断地干预一切活动领域的权力，由此将会出现一个更为自由和准民主的政治体制，但它仍将寻求集中政治权力，并用一种权力来支持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发展。与之相反的是，到2020年，即便出现一个所谓“完全的民主体制”——虽然发生的机会非常小——它也很可能是无法管制的公众要求在此前某个阶段使政治体制崩溃的结果。然而，由于中国的极端复杂性及其政治历史，从一种伤痛中产生出来的任何民主体制可能皆是制度上虚弱并高度腐败的，并且强大的地方势力会不断测试一个国家的统一的底线，各种政党更可能代表的是地方而非全国性的社会利益集团。如果某种危机和变革真的发生，那么，2020年的中国就可能具有2003年印尼政体的许多噩梦般的政治特征。

综上所述，从历史、现实以及未来的视角整体考虑<sup>?</sup>，似乎中央集权体制才应是中国历史本来的方向。

---

<sup>46</sup> 参见美 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2-355页。